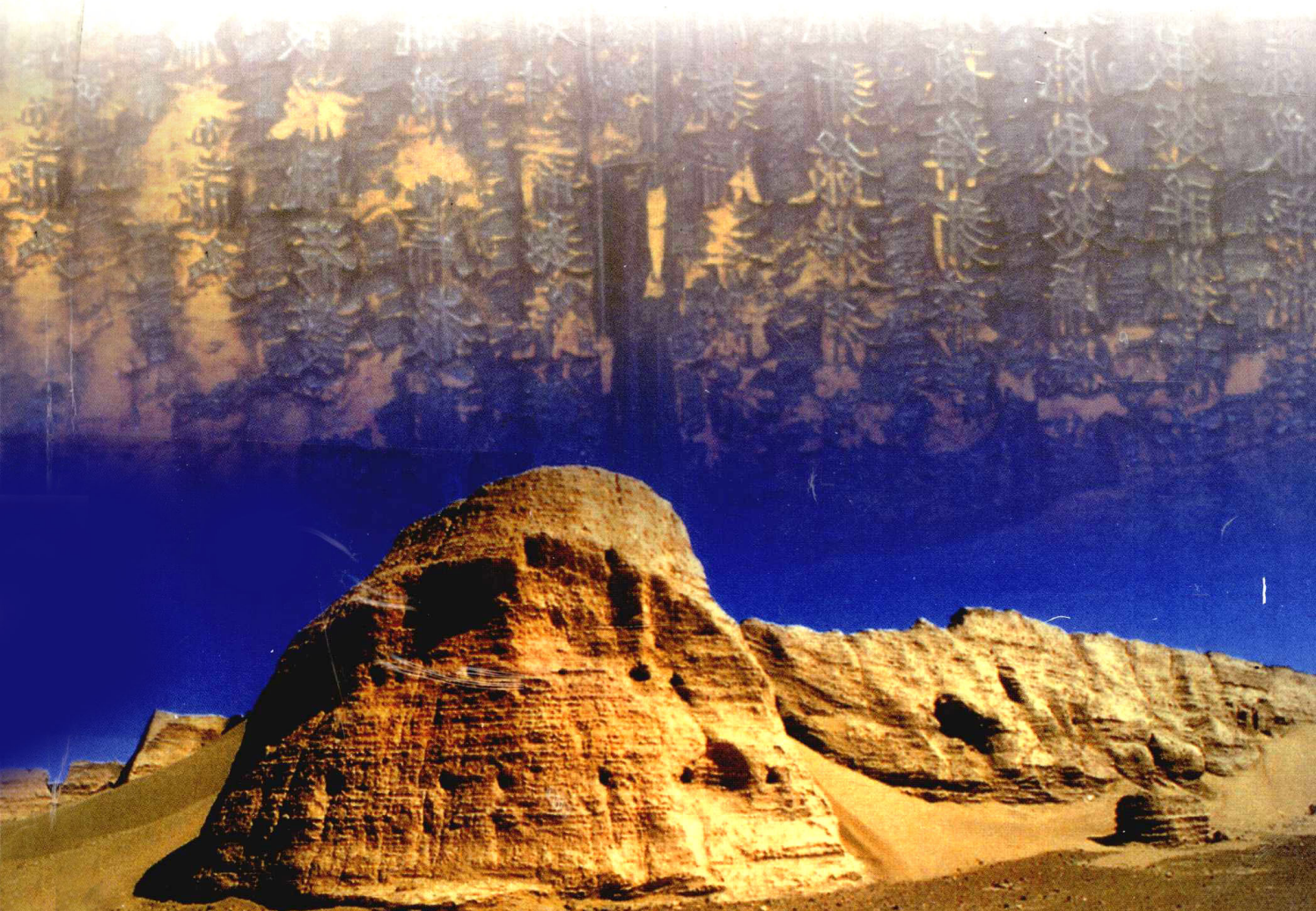


——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 ——

《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本课题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专项资助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 《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 孙伯君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 11
ISBN 7-80608-962-4

I. 黑... II. 孙... III. ①等韵学—研究②解释歌
义—研究 IV. H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5651 号

黑水城出土等韵抄本《解释歌义》研究

孙伯君 著

责任编辑/车满宝

封面设计/易 生

责任校对/王天芹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246

印 刷/甘肃地质印刷厂

厂 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邮政编码/730060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179 千

印 张/7.75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7-80608-962-4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孙伯君, 河北省秦皇岛人, 1966年3月出生。1984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同年分配至沈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主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音韵学”等。199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师从聂鸿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宋元史籍中的女真语研究》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一等奖。2003年博士毕业后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 女真、契丹、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民族古文献整理, 藏语语音学等。正在主持和参加的课题有“国外早期西夏学史”、“女真文碑铭汇释”、“契丹语研究”(聂鸿音主持)、“中国少数民族字符集”(黄行主持)、“中国的语言接触研究”(周庆生主持)等社科院、民族所重点及教育部重点课题。

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女真译语〉中的遇摄三等字》(《民族语文》2001年4期),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西夏译文》(《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4期), 《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3期), 《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2004年1期), 《宋元史籍中女真语的标音》(《民族语文》2004年4期), 等等。已出版的专著有《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4年)。

提 要

《解释歌义》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西夏黑水城遗址一座著名的塔中发现的一大批图书中的一种，现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一部关于汉语等韵门法的著作。据考证，写本年代当在12世纪~13世纪初期，作者联系金代等韵学空前繁荣的大背景和此书中的众多线索，推测《解释歌义》是由金朝女真人撰写，然后传入西夏的。《解释歌义》的面世证实了韵书关于门法创自智公的记载，为我们解决了等韵门法创始人是智邦这一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主体部分——王忍公等韵门法歌诀，据作者考证，很可能就是《郡斋读书志》记载的王宗彦《四声等第图》。歌诀部分归纳了等韵各个门法的具体内容，蕴涵了元明等韵门法的主要形式，其详细程度可以说没有哪一部现存韵书可与之相比。其中对智邦《指玄论》的吟咏，在客观上保存了等韵门法的源头经典之作《指玄论》的内容，为我们了解早期等韵门法及等韵学上的相关概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无名氏的注释以“义曰”形式与王忍公歌诀隔开，是现存关于《切韵指玄论》和《四声等第图》的惟一注本。

本书作者倾多年心力，潜心研究《解释歌义》。内容涉及此书的成书年代、歌诀作者的考证、等韵概念的解释、歌诀所蕴涵的反切体例的注释和说明、与《广韵》反切之比较等诸多方面。

序

研究一门学问一定要从它的源头讲起,所以古代汉语专业的著作在谈到四声时不会不提沈约,在谈到韵书时不会不提陆法言,在谈到字母时不会不提守温。可是,如果问及等韵门法的始创人是谁,恐怕就要哑场。事实上,人们对此掌握的史料只有宋代《四声等子》中的一句话:“关键(门法)之设肇自智公。”不过遗憾的是,人们不但至今没有见过这位智公的著作,甚至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抄本《解释歌义》的发现意外地为解决音韵学史上的这个悬案带来了曙光,而这也就是孙伯君这本研究著作的首要意义所在。众所周知,当初学界也仅仅是从史书中见到过“守温”这个名字,此外再没有其他资料,只是一个世纪前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抄本“守温韵学残卷”之后,文献上的零星记载才得到了决定性的验证。由此看来,西夏本《解释歌义》的价值亦当不在敦煌本“守温韵学残卷”之下。

《解释歌义》原书于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A6。这是一种纸幅很小的“巾箱本”,现存仅为后半部分,且卷尾也已残佚。全书存40叶,有7800余字,由于抄写时的漫不经心,书中的讹误衍夺不在少数,估计抄写者甚至原作者的文化程度都不很高。书的现存部分未见撰者或抄写者题款,仅在首叶题有书名“解释歌义壹卷”,其中“卷”显然当是“本”字。正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自称为“颂”,多是等韵门法的歌诀;另一部分自称为“义”,是对“颂”的逐句解释。全书现存部分有“颂”13首,依唇、舌、牙、齿、喉五音顺序排列,为原书的第七门至第十一门。

书中多次提到智邦的《指玄论》一书,看来《指玄论》本来是原书的主体,可惜已经全部亡佚。现在我们从王忍公的“颂”和无名氏的解义推测,《指玄论》一书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等韵图,另一部分是智公对忍公所问等韵门法的回答。等韵图编的比较简略,也许所谓“以重轻四等列之一十六韵”就是列成16幅等韵图表的意思。智公初编的等韵图只用平声以赅摄上、去二声,并没有入声一类,现图中的入声八图64字(含空位)是忍公补进去的。这就是说,《指玄论》是由智邦初编、王忍公增补的一部等韵学著作。

著名的宋代等韵图《四声等子》在序言中又把等韵门法称为“关键”，并指出“关键之设肇自智公”。音韵学界长期以来不知道这位始创等韵门法的“智公”是谁，而现在我们凭黑水城出土的《解释歌义》已经可以大致相信，这位智公应该就是《指玄论》的作者智邦。至于《指玄论》一书，则可以联系到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二》里著录的那种三卷本《切韵指元论》。郑樵没有写出这部书的作者姓名，如果考虑到宋人常为避皇帝祖讳而改“玄”为“元”的事例，现在我们似可相信它就是智邦和王忍公所作，换言之，《解释歌义》中说的《指玄论》和《通志》著录的《切韵指元论》很有可能是同一种书。

《解释歌义》的现存部分没有明确写出它和《指玄论》的编撰年代，我们目前只能根据书中透露的线索来进行一些推测。比较引人注目的线索是“自古难明今义出”一句的解义，其中明引《指玄论》说：“自唐以来，未见其义所出，斯论其哉美矣。”（末三字疑当做“美矣哉”）这里既然把“自古”解成“自唐以来”，那么我们当可据此断言《指玄论》编撰时间的上限是唐王朝灭亡的公元907年，也就是说，《指玄论》应该是五代或宋时的作品。至于《指玄论》和《解释歌义》编撰的时间下限，我们可以通过其分韵和反切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分韵上看，可以发现《指玄论》采用了一种极为罕见的韵类格局，“前三韵上分帮体”和“后一音中立奉形”两句的解义都说到《指玄论》收录“平声五十九韵，并上去入声共有二百七韵”，“入韵八行王氏括”句的解义又说到该书的入声有35韵，这样算来，《指玄论》的韵类就应是平声59、上声加去声113、入声35，这与《广韵》平声57、上声加去声115、入声34的韵类格局差别颇大。《解释歌义》没有提供各韵的名目，所以人们还无法确定《指玄论》比《广韵》多出的韵和减少的韵究竟是什么，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可以相信智邦和王忍公在编撰《指玄论》的时候一定是参照了《广韵》之前的另一部韵书，而并没有见到《大宋重修广韵》，否则他们是不会置政府颁布的标准韵书于不顾而另搞一套的。

其次从反切上看，可以发现《解释歌义》用以说明门法的反切例子并非引自《广韵》。在这部书的全部72例反切里，有26例是和《广韵》不同的，除去一些明显的误字以外，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反切上字和被切字不同等列，如德山切謹（《广韵》陟山切）、丁𪔐切知（《广韵》陟离切）、得章切张（《广韵》陟良切）、女沟切孺（《广韵》奴沟切）、澄丁切庭（《广韵》特丁切）、娘尊切麤（《广韵》奴昆切）、驰草切道（《广韵》徒皓切）、居梢切交（《广韵》古肴切）。这种现象在等韵学上习惯称为“类隔切”，被认为是早期韵书反切的典型特征之一，在此它证明了《解释歌义》编撰的

时间下限是《广韵》问世的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结合以上线索我们可以相信,《指玄论》和《解释歌义》当写成于公元10世纪间。

《解释歌义》撰成之后的流传情况自然无法估计,但现在我们见到的这个本子却可以使人大致想定它当是西夏人所抄,这不但因为与它同时出土的大量黑水城资料都是12~13世纪的西夏文献,而且因为这个抄本本身也显示了一点非中原抄本的特征。首先,12世纪间的宋朝人在写书时大都避讳“玄”字,或者缺其末笔,或者索性改“玄”为“元”,但《解释歌义》通篇不见这类讳例。其次,书中在解释王忍公的姓名时说:“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其中的“名”字应该是抄写者妄增,以“氏”为名绝然不合汉人习惯,这在中原地区是常识,但在世居西北的西夏番人之间却不然。事实上,不但是平民百姓,即使是西夏的高级番人知识分子有时也弄不清汉人名字的结构,例如在西夏乾祐十二年(1183年)政府刻字司刻印的西夏译本《类林》里,就屡屡出现称诸葛亮为“葛亮”、称申屠刚为“屠刚”之类错误。

一般认为,在《韵镜》、《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宋代韵图的文字说明部分中已见等韵门法的雏形,这些以指导反切拼读为目的的等韵门法集大成于元代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和明代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但事实上早在公元10世纪的《解释歌义》便已展现了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端倪。通过孙伯君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释歌义》中不但出现了后代绝大多数等韵门法的内容,而且还直接出现了不少门法的名目。尽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智邦在《指玄论》里是否已经把这些门法分门别类地列了出来,但是《解释歌义》对此类问题的论述竟然如此明确,如此具有系统性,这实在使我们不能不相信《指玄论》和《解释歌义》就是元明等韵门法著作的直接或间接的源头。当代的音韵学著作往往认为等韵门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后来又有刘鉴和真空的发明,这在现在看来恐怕是不对的。

众所周知,早期从事等韵学研究的都是佛教僧侣和一些民间小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不少连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他们的著作也不会流行得很广。现存包括《解释歌义》在内的等韵学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解释韵图归字或指导拼读反切的“歌诀”,这些歌诀的内容大致一样,但具体文字则颇有差别,这似乎表明各位作者在自撰歌诀的时候并未参考前代的现成著作,而仅仅是总结了民间流行的一些拼读反切的窍门。或者说,门法歌诀有些像现代小学语文教师为帮助学生识字而自编的一些熟语,例如说“告”字是“一口咬掉牛尾巴”之类。这些熟语作为某种权宜的教学辅助手段自然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却往往与语文科学本身不

符,因此难免被专家学者看成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事实上,从古到今的中国学者对等韵门法的评价也充满了同样的矛盾——一部分学者强调它在初等教学中的实用性,认为这是受人欢迎的等韵典要;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它在专业理论上的非科学性,认为这是误人子弟的妄生枝节。我们暂不必对等韵门法做出总体性的价值评判,这里仅提请汉语音韵学界注意以下两个事实,以利将来的讨论。第一,《解释歌义》中不止一次地指责前代韵书的编者“暗昧”、“不达政理”,同时声明作者制作韵图和门法歌诀是对前人错误的匡正,这显然是由于智邦和王忍公不懂得古音不同于今音的道理,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尽管我们可以考虑到时代的局限而不必就此责难作者,但这一事实毕竟证明了门法歌诀从产生伊始就建立在了错误的理论之上。第二,《指玄论》的作者智邦和既是《指玄论》的作者又是《解释歌义》中“颂”的作者的王忍公是同时代人,他们之间的交往还十分密切,这显然说明,即使是在最早期阶段,等韵图和门法也是同时产生的。现在有一派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门法的出现是在韵图的编纂之后,例如李新魁在《汉语等韵学》一书中说:“韵图既成,法有未善,后人为例以明之,为读韵图者之一助。”现在看来,李先生的这种说法似应再加考虑。打一个也许并不太恰当的比方——作为“现代等韵图”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图表之后不是也要同时附上几条说明么?

应当承认,我读《解释歌义》时所花的功夫远远不能和孙伯君相比,惟一值得夸耀的仅仅是在俄国亲自翻阅过这本书的原件,手上沾过一点八百年前的尘土而已。所以,以上谈的只是不成系统的个人看法,其中还有个别地方和孙伯君的意见相左,然而我相信,在读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著作之后,读者从中一定能体会到早期等韵学的真谛,也一定能体会到作者对于这门濒临绝迹的学问的痴情。

聂鸿音

2003年10月26

目 录

导论	(1)
一 《解释歌义》概述	(5)
二 点校注释篇	(12)
解释歌义壹畚(本)	(12)
舌音切字第八门 舌头	(15)
舌上音切字	(17)
牙音切字第九门	(19)
齿音切字第十门	(20)
正齿音切字例	(22)
喉音切字第十一门	(25)
七言四韵颂曰	(28)
七言四韵歌奥	(29)
三 研究篇	(32)
(一)等韵门法的创始人智邦和《指玄论》	(32)
(二)“颂”“赞”作者王忍公及其著作	(38)
(三)《解释歌义》中的等韵概念	(43)
(四)《解释歌义》中的早期等韵门法	(47)
1 音和	(49)
2 类隔	(52)
3 互用	(54)
4 窠切	(56)
5 能切	(57)
6 振救	(57)

7 寄韵	(58)
8 凭切	(58)
9 广通(通广)	(60)
10 偈狭	(63)
11 内外	(64)
12 交互为韵	(66)
(五)《解释歌义》与《广韵》反切之比较	(68)
四 《解释歌义》原文	(71)
参考文献	(112)
后记	(114)

导 论

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古音学和今音学相比,等韵学更重视用图表的形式分析汉语语音,按等区别不同的韵类甚至声类。而通过各种门法解释古代反切原理也是等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等韵学又被称为“反切之学”。关于等韵学与古音学、今音学的区别,清末劳乃宣《等韵一得》概括说:“有古韵之学,探源六经,旁征诸子,下及屈宋,以考唐虞三代秦汉之音是也。有今韵之学,以沈陆为宗,以《广韵》《集韵》为本,证以诸名家之诗与有韵之文,以考六朝以来唐宋之音是也。有等韵之学,辨字母之重轻轻浊,别韵摄之开合正副,按等寻呼,据音定切,以考人声自然之音是也。”劳乃宣对等韵学所下的定义实际概括了这门学问研究的具体内容,即制作韵图分别声类、韵类,包括声母的发音部位、清浊,韵母的等呼开合;制定反切门法,根据古反切拼切时音等。

等韵学的历史非常悠久,萌芽于唐以前,形成于唐五代之际,宋代蔚为大观,此后元明清时期又有所阐发。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把整个等韵学史分为两大阶段:“唐、宋、元时期为前期,可称为古代等韵学或者叫中古等韵学;明清至民国期间为后期,可称为近代等韵学或者叫近古等韵学。”^①等韵学的产生是以韵图的出现为标志的,等韵图的制作当是受悉昙章的启发,悉昙章是梵语元音和辅音展转相拼的音节表,随着佛教传入我国。因韵图是韵书的辅助读物,按韵书的反切分图列字,所以一般认为韵书出现后才有韵图。据目前所知,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韵图的出现当在此之后。据郑樵《通志·校讎略》第一记载:“《内外转归字图》、《内外转铃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韵海镜源》是唐代颜真卿编纂的一部总集,由此可推论韵图在唐代已经出现。现存最早

①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5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的等韵图是张麟之所刊表的《韵镜》，《韵镜》的作者已无从考证，有人认为作于唐朝，有人认为作于宋朝。较早的韵图还有郑樵《通志·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

由于韵图按韵书的反切分图列字，所以大凡韵图都要论及反切拼合原理，传统上把古人制定的使用韵图拼合反切的法则、条例称为等韵门法。等韵门法一般认为肇端于宋人张麟之，后来有《四声等子》后的文字说明，集大成于元代刘鉴《切韵指南》和明释真空的《直指玉钥匙门法》。李新魁《汉语等韵学》第130页：“门法之产生，可以说是由宋人张麟之启其端，后代续有继作，至明代真空和尚手中而臻于完备。”但从现存资料看，门法的产生要早于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有一段话讲到等韵门法，^①曰：

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类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微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庞驳，师法多门。

这段话尽管讲得非常笼统，但却讲到了反切自沈约以后开始繁复，让我们推想门法产生的必要条件乃反切与时音不合，启等韵门法之端者肯定要早于宋人。关于等韵门法的创始人，《四声等子》序言也有一段记载：^②

① 沈括著，刘尚荣校点：《梦溪笔谈》（新世纪万有文库本），85～8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本文引用时标点有所改动。

② 《四声全形等子》，见《四库全书》，第238册。

切详夫方殊南北声皆本于喉舌,域异竺夏谈岂离于唇齿?由是《切韵》之作,始乎陆氏,关键之设,肇自智公。传芳著述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致使玄关有异,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论,以三十六字母约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画为四类,审四声开阖以权其轻重,辨七音清浊以明其虚实。极六律之变,分八转之异,递用则名和音,徒红切东字;傍求则名类隔,补微切非字;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和会切会字;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商量切商字;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唇字;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巨宜切其字,巨邪切祁字;无字则点案以足之谓之寄声;韵缺则引邻韵以寓之谓之寄韵。按图以索,二百六韵之字虽有音无字者,犹且声随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吴楚之轻清就声而不滥,燕赵之重浊尅体而绝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谓尽善尽美矣。

这段文字所说的“关键”即指等韵门法,指出智公是等韵门法的创始人,曾著有《指玄论》,而且《指玄论》已具有许多门法的名目和体例。可见启门法之端者也不是张麟之,而是智公。现存论及门法的韵书如《四声等子》有门法十一:音和、类隔、窠切、振救、正音凭切、互用门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母寄韵、双声、叠韵等;《切韵指掌图》有门法九:凭韵、内外转、往来、双声、叠韵、广通、侷狭、类隔、音和等;《切韵指南》有门法十三: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等;真空《直指玉钥匙》有门法二十:音和、类隔、窠切、轻重交互、振救、正音凭切、“精”“照”互用、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通广、侷狭、内外、“麻”韵不定、前三后一、“精”“照”寄正音和、就形、创立音和、开合、通广侷狭等。以上门法,真空的二十门法名目最多,但与刘鉴的十三门法相比,只是在刘鉴基础上把一些声类单立出来。由于除了《四声等子》,其他韵书再无关于智公及其《指玄论》的更为详细的记载,人们也无从知道《指玄论》共分多少种门法,所以学界一般认为门法集大成于元代刘鉴。

《解释歌义》是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一部汉语等韵门法著作。据考证,写本年代当在12~13世纪初期,我们联系金代等韵学空前繁荣的大背景和此书中的众多线索,推测《解释歌义》是由金朝女真人撰作,然后传入西夏的。《解释歌义》的面世,证实了韵书关于门法创自智公的记载,为我们解决了等韵门法创始人是智邦这一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解释歌义》正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自称为“颂”,为等韵门法的歌诀,作者为王忍公,据我们考证,这些歌诀很可能就是《郡斋读书志》所记载的王宗彦《四声等第图》的一部分。尽管现存部分从“唇音切字第七门”开始,前面对智邦《指玄论》的注释、补充及韵图部分已经残掉,但歌诀所阐发的门法体例是相当完整的,蕴涵了元明等韵门法的主要形式,其详细程度可以说没有哪一部现存韵书可与之相比。而且王忍公的著作还不单纯是几组歌诀,部分内容是对智邦《指玄论》所涉及门法的归纳和吟咏,这就在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了等韵经典《指玄论》的内容,为我们了解早期等韵门法及等韵学上的相关概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解释歌义》另一部分以“义曰”形式与歌诀隔开,是对“颂”的逐句注释,其作者已无从考证,是现存关于《切韵指玄论》和《四声等第图》的惟一详细注本。

通过把《解释歌义》与《切韵指南》、《四声等子》等韵书中所载等韵门法进行对比,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指玄论》是现存等韵门法的源头,《切韵指南》中被称为门法主干的13门法的体例和名目已经出现在《指玄论》中。可以说,《解释歌义》的重新面世,为我们澄清了许多关于等韵门法的模糊概念,把等韵门法创立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实为音韵学界的一大幸事。

一 《解释歌义》概述

《解释歌义》是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一部汉语等韵门法著作。据考证,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最详细的等韵门法著作之一。^① 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Kozlov)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黑水城遗址的一座“著名的塔”中发现了一大批图书,其中除了包括迄今世界上最多的西夏文书籍外,还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解释歌义》就是其中的一部。此书今藏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为A6。原书的纸幅很小,为“巾箱本”,共存40叶,现存为全书的后半部分,且卷尾有残佚。此书未见撰者和抄写者题款,仅在首叶题写书名“解释歌义壹卷”,“卷”显然为“本”字通假。原文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颂”,作者是王忍公,他有感于拼读韵书反切门法的创立者智邦所作《指玄论》,而用歌诀形式对其进行了阐释。阐释部分针对唇舌牙齿喉五音而作,分别就五音中所涉及的音和、类隔等门法做了概括,计有92句;阐释之后有颂赞,进一步表明了王忍公对等韵门法的批评和理解,原文有残佚,颂赞只存14句。另一部分被称为“义”,是无名氏对王忍公“颂”的疏解,通俗易懂,近于白话。这部分所涉及内容非常广泛,除了能帮助我们理解“颂”,从而正确拼读韵书反切外,还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智邦和王忍公的情况。

1914年,伯希和首次向学界系统报道了黑水城出土文献,但并未提及《解释歌义》,^② 1984年,俄罗斯西夏语文学者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在《黑城出土汉

① 聂鸿音:《黑水城抄本〈解释歌义〉和早期等韵门法》,载《宁夏大学学报》,1997(4)。

② P.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es par la mission Kozlov a Khara-khoto,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23, Mai-Juin, 1914, pp. 503~518.

文遗书叙录》中首次对这个写本做了详细著录,^①叙录内容不仅包括此书的版式、装帧、纸色和内容,还包括许多书写在此书纸背上的有关文字信息。尤为可贵的是通过纸上的红墨痕迹,孟列夫大胆推测了此书的抄写年代在12世纪下半期。1993年,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合作整理出版俄国黑水城特藏,此书编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卷,第140~160页,于1996年出版。由于原件很难看到,公开发表的照片又很难反映纸色、装帧和纸背的情况,现把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第227页对此书所做的描述转录如下:

282(原藏录号 A6)

《解释歌义壹卷》解释韵书结构的诗注。诗歌是七言,押韵。诗注被标上“义曰”二字。各篇的标题是:《舌音切字第八门》、《舌上音切字》、《牙音切字第九门》、《齿音切字第十门》、《正齿音切字例颂》、《喉音切字第十一门》、《七言四韵颂》、《七言四韵歌奥》。写本,小册子,把较薄的几叠用蓝粗线缝在一起,共五叠,每叠八个双页,最后一叠是开头的两页。字面一页向里,一页向外,轮流交错,第二至四叠末尾左上角有该叠的数码。面幅8×11厘米,栏面6.5×8.5厘米,栏线和界格用尖木笔画出,有些地方被画透纸面。面7行,行11—13字,有改写。纸色灰。小楷字体,有首题。首页上加贴了封皮,封皮上有外题字(半行)和重复写了两次的大字“尚面文”,其上有红墨痕迹。(12世纪下半期的。)

从“帮非互用稍难明 义曰帮”到“楚侯别玉人 门非[蒔兰莫]□”。所有书页的背面均有写下的笔记,字体拙劣,大小不一,其中有下列文字:

- 一 第2面,“五供养”,第12面上也有。
- 二 第3面,“七宝供养”。

^①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